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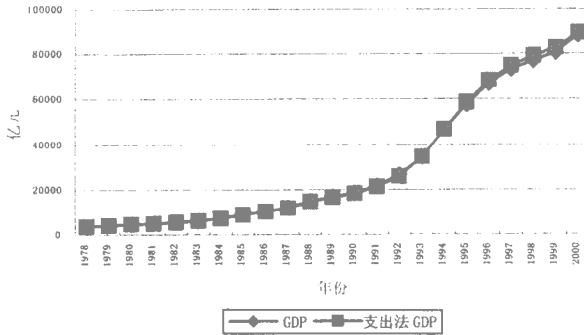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

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需求结构及其变动（1953年）。但是，中国经济理论界与实际部门似乎历来都未把需求结构及其变动作为中心问题给予应有的重视。即使是理论部门都形成的“内需不足”的共识，也大都看做为总量性问题，而非结构性问题。如政府采取的刺激内需的政策基本是沿用凯恩斯主义的总量扩张政策，采取的结构调整的政策又排除了需求结构的调整。这类政策是否有效，这类认识是否正确，这是必须给出判断的问题。所谓需求也就是支出，所谓供给则是收入。总供给超过总需求，即总收入超过总支出，称为供给过剩或需求不足。从中国 1978 年～2000 年的总收入（GDP）与总支出（按支出法计算的 GDP）看，两者

图 1-1 1978 年 ~ 2000 年
GDP 与按支出法计算 GDP 的总量及其变动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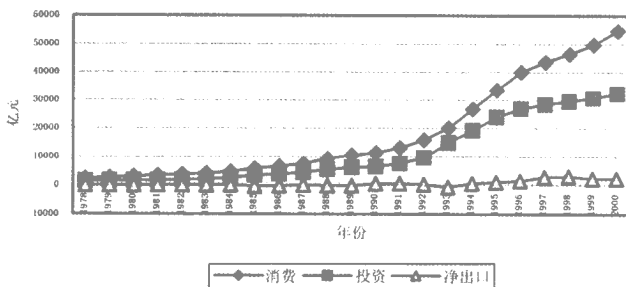


说明 按照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有关数据绘制。

图 1-1 表明, GDP 总收入与按支出法计算的 GDP 总支出的历年总量基本吻合,即基本相等,出现有些年份总收入稍高、有些年份总支出稍高的原因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不等于国内生产总值是由于计算误差的影响。”^①照这样看,总供给与总需求始终均衡,不存在需求总量不足问题。

需求等于消费(C)、投资(I)与净出口(NX)之和。判断需求不足的最为简明的指标是消费(C)、投资(I)、净出口(NX)是否出现逐年下降态势。见下图:

图 1-2 1978年~2000年消费、投资、净出口的数量变动图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年 第 61 页。

说明：按照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2001》（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年）有关数据绘制。

图 1-2 表明，1978 年～2000 年间消费总量逐年提高。投资总量与消费总量的变动相似；净出口总量有些年份为负、有些为正，但是近几年均为正，均为上升，总体上进、出口大体均衡。照这样看，同样不存在总量性需求不足问题。

那么，理论界与实际部门认为需求不足因而致力于启动需求（启动内需）的依据又何在呢？看来主要在供给方面。其具体表现是：

产品过剩。1998 年上半年，国内市场的 601 种主要商品已经没有了供不应求现象，而供给超过需求的占 25.8%，其余 74.2% 则供给与需求均衡。到 2001 年下半年，供给超过需求的主要商品^①已经占到 80% 左右。2002 年初的统计为 86% 以上。

生产能力过剩。产品过剩并非由于生产能力利用率过高，相反，倒是在生产能力利用率相当低的情况下出现的。国家统计局对 9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普查，1995 年半数以上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于 50%。到 1999 年，尽管经过调整，如自行车、摩托车、家用洗衣机、家用电冰箱、电风扇等等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能力从 1995 年到 1999 年间有所下降，其中电风扇从年产 13 246 万台调整到 2534 万台等。但是，1999 年的重点工业企业主要生产能力，从可以比较的 31 种看，超过 2000 年全年产量的依然达 24 种，占可比总数的近 80%，其中彩色电视机的生产能力 7028 万部，2000 年产出 3936 万部，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 60%。大中型拖拉机的生产能力为 15 万台，2000 年仅产出 4.1 万台，利用率不到 30%。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统计的仅仅是重点工业企业的生产能力，如果考

① 经济学原理是总需求等于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NX）之和（见曼昆的《经济学原理》等各种教材）但是，《中国统计年鉴》把政府的消费、投资分别计入了消费（C）、投资（I）。这样，中国的需求（总需求）就成了消费（C）、投资（I）与净出口（NX）之和，以后的讨论均按此分类。

虑到非重点工业企业，全国生产能力的过剩情况还要严重得多。

劳动力过剩。城镇失业率趋高，尽管《中国统计年鉴》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仅从 1996 年的 3.0% 上升到 2000 年的 3.1%。但是，如果包括未登记者，国有或城镇集体企业职工下岗以后未能重新上岗者，城镇化过程中征收了农民土地应予以安置而未安置的农村劳动力，再按国际惯例统计那些寻找工作超过 1 周或 2 周的劳动者，那么，实际失业率远远不止 3.1%，早就超过国际警戒线的 10% 了。至于中国农业的过剩劳动力之多更为众所周知，而乡镇企业的从业人员也从 1996 年的 13 508 万减少到 2000 年的 12820 万，从而又增加了农业过剩劳动力。

资本过剩。作为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的各项存款，从 1995 年起就超过各项贷款数（超过 3338 亿元）到 2001 年已经超过 3 万亿。而且其间中国人民银行 7 次降息，始终未能遏止住这种存贷差的上升。于是又有了第 8 次降息（2002 年 2 月 20 日）。

价格下跌。供过于求，势必表现为价格下跌。从 1997 年底开始，中国的商品价格持续下跌，与上年相比，商品零售价格 1998 年下跌 2.6%，1999 年下跌 3.0%，2000 年下跌 1.5%。^① 并且应当看到，这种价格下跌是在国有垄断部门不顾商品价格总体下跌之势，我行我素地持续涨价的情况下发生的。如 2000 年的水电燃料价格上涨 7.7%，服务项目上涨 14.1%（主要来自国有垄断行业的服务价格上涨：如学杂保育费上涨 28.8%、医疗保险上涨 11.1%、邮费上涨 7.8% 等）。2001 年看起来已经止跌，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升 0.7%，但也是由国家垄断部门如服务文教娱乐价格上升所致，食品之类价格还在下跌。到 2002 年上半年，又下跌 0.8% 居民消费价格。^②

从供给方面的这些数据看，又确实存在超过总需求的问题。但这似乎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总供给过多的问题。既然如此，应当研究供给，不应当研究需求。当然这只是表面的观察。通过对

本页的各种统计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1）》

^② 《中国统计年鉴（2002）》。

供给过多这种过剩现象的思考，不难发现，供给取决于需求。并且直接取决于投资需求；而供给过多（供给过剩）当然直接取决于投资过度（投资过多）由于需求总量每年都是既定的，因此投资过度（投资过多）必定是消费过少（消费过低）这显然进入到了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需求结构问题，对此，我们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终于找出了中国存在需求不足现象的原因，但是，其性质不属于总量性，而是结构性，属于需求结构失衡引起的结构性需求不足。这个基本判断，是要提出分析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需求不足属结构性需求不足，那么，其时限多长，是从 1997 年以来出现的，还是以往就存在的？由于前面列举的供给方面的种种过剩现象都是近几年的，所以，需求不足似乎也是短期的，但是，我们并不限于这个考察，而是把时限放长，对 1949 年以来的 50 多年间的中国需求结构进行考察，以便判断中国的结构性需求不足是短期的（如仅仅限于 1997 年以来）还是长期的（如 1978 年以来乃至 1949 年以来）假如属短期的，那么，与长期的需求结构变动有何关联？假如属长期的，那么，其期限究竟为多长，是近 20 多年还是近 50 多年？如果确为长期的，又怎么看待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的所谓短缺？

第三个问题是，需求结构的失衡与结构性需求不足的形成原因何在？由于我们对中国的需求结构做出的是长期考察，所以，对当前的结构性需求不足的形成原因也做了长期考察。即使这种结构性需求不足仅仅是短期的，恐怕也与长期的结构变动有关，也就是说，要从长期的结构变动中探讨过去为什么没有发生，而现在会发生这种结构性需求不足现象。如果这种结构性需求不足并非短期现象，那就更应当从长期的结构性变动之中去探讨其形成原因了。对成因的考察恐怕也有深浅之分。不仅要分析浅层次（层面）的形成原因，更要分析最深层次（层面）的形成原因，以期求得规律性的认识。

第四个问题是，如果中国存在结构性需求不足，那么，其未来走势又怎样？中国结构需求不足的未来有哪几种主要的可能走势？其中哪种可能走势又比较合理？中国结构性需求不足的这几

种主要的可能走势的现实性又如何？这些可能走势变成现实走势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什么？如何对各种可能走势做出比较，以选择其中最为合理的可能走势？这种最为合理的可能走势变成现实走势的种种条件是什么？这些条件具备了没有？具备了的条件如何使之更充分？没有具备的条件如何使之具备？最终求出结构性需求不足的消解。为更好地判断种种走势的可能性、合理性、现实性及其相关的充分必要的条件，有必要进行较为抽象的考察，如假定为“封闭”即不考察净出口。这种抽象是科学合理的，因为净出口从长期来看基本趋于均衡。

第五个问题，对策讨论。这里的对策主体主要指“政府”。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最典型的计划经济国家。“国家”及其“政府”拥有全部资源配置权。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实行者也是“国家”及其“政府”。尽管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有所进展但是至今“国家”及其“政府”仍然握有相当高的资源配置权。因此，“需求不足”“启动内需”成了国家及其政府的主要议题。国家（政府）也出台了种种政策以“刺激”需求。对这种政策以及国家（政府，这儿主要指中央政府）的行为如何评价？问题在于评价标准。刚刚说到国家（政府）的应对需求不足的种种对策的这几种评价所采用的标准基本上是规范的，而不是实证的。对策是应对实际运行的。因此，应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对策首先必须判断有效需求不足的性质，其次判断其形成原因，再次从长期的如至少从1978年以来最好从1949年以来的经济运行过程做出这些判断，而不是简单地只看到近几年的情况做出应对。因为只有从长期运行过程中才能做出基本走势的判断，进而才能做出切合实际的应对。然而，“政府”的应对由于种种原因往往是短期的、应急的，往往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嫌。怎样冷静地把握50多年特别是近20多年来中国的需求及其结构变动？怎样把握其背面的客观实在的基本成因，进而把握其未来走势？又怎样从中找出较为合理并且较为现实的可能走势？并且怎样以此去评价现有的种种对策？对策的制定者是“国家”但主要是“政府”。“政府”又分“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还包括各个部、委、办等。所有这些

“政府”都有应对需求不足之策。他们出于自己的权益（现有的资源配置权及其收益），往往会有各自的对策，这些对策之间往往有统一又有矛盾。因此，必须依据客观存在的中国需求及其结构的全部变动过程，依据这个变动过程呈现出来的规律，对所有这些对策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哪些应予肯定，哪些应予否定，哪些应予调整，哪些应予补充，又要制定哪些新的、新的对策建议，是否应当包含中、长期的，以及与这种中长期对策相互配套的短期的对策。这也是必须研究并且给出应有的回答的。当然，限于时间，更限于我们的实践，所以，这里恐怕只能给出一个总的对策思路，具体政策的制定并非我们之力所能及。

1.2 基本名词

刚刚所提出的若干问题涉及许多名词，需要给出界定。

需求。经济学概念的需求，总是指有效需求。因为现今统计的需求都按支出法。

有效需求。按照凯恩斯的定义为：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相等时的总需求价格。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也就是总收入等于总支出。所以，有效需求必须是有支付能力的、又愿意支付的需求。如果有需求欲望，但无支付能力，就不是有效需求。如对家用小汽车有需求欲望者不在少数，但是，其中的多数或绝大多数没有支付能力，他们的这种欲望不属于“有效需求”或不属于“需求”。如果有支付能力但没有需求欲望、或需求欲望已经得到满足，也不构成有效需求或不构成需求。如大城市的人们对粮食（如大米）的需求不仅不会增加反而趋于下降，尽管他们对大米的需求有足够的支付能力。

有效需求不足，指供给超过需求的情况。宏观经济学的总量定义是：总供给 = 总需求。但是，现实情况是，总供给内含的商品、劳务对部分人来说是不再需求的了（即有支付能力但已经得到满足）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是有需求欲望，但无支付能力，这样就出现了所谓供过于求的现象，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因此，有效

需求不足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相对不足，即有需求欲望，但无支付能力；另一种属于绝对不足，即有支付能力但不再有增量需求欲望。对两种需求不足中的后一种现象往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其实这种现象也是普遍存在，其产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供给方面的产品、劳务的更新换代，使得人们对旧产品、旧劳务的需求欲望消失，尽管他们有支付能力；另一种来自需求方面的心理、生理界限，如吃饭总有个绝对临界度。如中国以前流行的“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看重的“钢”、“粮”就都存在这个临界度并且这个临界度还有向内收敛趋向。当然，对具体产品、劳务的需求，往往相对不足与绝对不足共存，如许多低收入家庭对彩电之类没有支付能力，但是许多高收入家庭对原有的彩电之类尽管有支付能力但无需求欲望了。

总量性需求不足。现有的经济学原理所说的有效需求不足源自凯恩斯。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源自三大心理规律^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使越来越多的收入转为储蓄，使消费不足，进而使总需求出现缺口；“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规律”使储蓄不转为投资，导致投资需求不足；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规律”使人们总喜欢保留部分货币在手，或引起消费不足，或引起投资不足。因此，按照凯恩斯的论证，总量性需求不足应当定义为：需求总量下降导致的需求不足。而且这种需求总量下降表现为消费需求下降，也表现为投资需求下降。据此，中国当今的有效需求不足或需求不足不属总量性，因为无论消费还是投资都持续增长，充其量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而已。

结构性需求不足，即由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的需求不足。所谓结构，是整体内在所含的各个元素、各个部分之间比例关系的总和。^②需求作为一个整体，包含消费(C)与投资(I)和净出口(NX)。考虑到净出口(NX)从长期看基本趋于均衡，所以，需求结构的失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麦克米伦公司 伦敦，1936年

^② 关于“结构”的内涵 参见有关系统论的论著 如魏宏森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徐永超与方永绥编的《系统工程基础》等。

衡与否主要标准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这也就是内需结构。如果稍为细化，那么，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失衡，不外乎为两种形式：消费比重过高，投资比重过低；消费比重过低，投资比重过高。消费与投资虽然同属需求，但是投资不同于消费的是又有供给效应。投资是供给增长的重要源泉，所以投资比重过低，供给增长放慢，比重过高的消费需求会趋向于不能得到相应的供给，亦即会趋向于供不应求，趋向于需求过旺而非需求不足。反之，如果投资比重过高，导致供给增长过快，而比重过低的消费需求不能消解这些供给，而趋向于供给过多、亦即趋向于供过于求、趋向于需求不足。消费与投资之间的这种比例关系又取决于性质关系：消费是目的，投资是手段。如果其性质关系被切断，投资不是为消费，而是为投资而投资（所谓为生产而生产），那么，即使投资比重过高，过高投资率形成高速增长及供给增长，不是为消费因而不能为消费，也会出现“供给过剩”。这种过剩又与消费需求（即使是过低的消费需求）不能满足因而表现为“短缺”的现象相互共存。当然，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性质关联被切断时，即使消费率很高，投资率很低，也会出现“过剩”与“短缺”共存现象。这样，所谓结构性需求不足也就应当定义为：需求整体内部的消费与投资之间的性质关系完全地或部分地不对应，投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过低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的需求不足。此外，需求结构还包含投资需求内部、消费需求内部的结构，以及投资需求所含的民间投资内部、政府投资内部和消费需求所含的个人消费需求内部的、政府消费需求内部的结构等等，也还存在失衡与否的问题，但是，这基本不妨碍刚刚对结构性需求不足所作出的定义，只会使得这个定义得到更多的含意。

供给过剩。亦即供给超过需求，其对应面也就是需求不足。

总量性供给过剩。即全部或绝大部分的产品、劳务及其要素资源的供给都超过需求。应当说明，这样定义是从即期或现期看的。所谓绝大部分的产品、劳务，大体界定在 70% 以上或 $\frac{2}{3}$ 以上，并且其余的 30% 或者 $\frac{1}{3}$ 产品、劳务不存在供不应求现象。作为要素资源，如劳动力、资本的供给及其要素资源的综合即生产能

力，也都存在比较严重的供过于求现象。如中国目前的供给过剩不妨定为总量性的，因为主要产品的 80% 以上供过于求。不仅私人产品，而且未计入的公共产品也存在过剩，如“开发区”、“飞机场”等等。并且生产能力、劳动力、资本等均供过于求。所以，供给过剩的对应面为需求不足，不等于总量性供给过剩的对应面必定为总量性需求不足，如中国目前的需求总量及其内含的投资、消费量都在上升，但又存在总量性供给过剩。

结构性供给过剩。供给所含的产品、劳务及其要素资源部分过剩与部分不足并存，而前者又超过后者，因而总量存在过剩的现象可以定义为结构性供给过剩。结构性供给过剩的背后往往就是结构性需求不足，如投资过多，并且过多的投资又集中于私人产品（劳务领域），结果是私人产品（劳务）的供给由于消费需求过少而无法被吸纳以致供过于求，但公共产品（劳务）由于投资进入很少而供不应求。因而结构性供给过剩也会表现为供给总量过剩。

1.3 有关文献

凯恩斯主义是首先为经济理论界与经济界所想到的理论。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有效需求不足论及其形成原因论（所谓三个心理规律论）和相应的对策论。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国家干预论”，这与中国传统的“国家统制论”有相通性。因此，中国更容易接受凯恩斯理论。这也是 1997 年以来中国应对内需不足的基本的政策取向。问题在于，一方面，中国的计划经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已经走到了尽头，因而启动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而实行凯恩斯主义意味着重新强化国家干预，意味着向计划经济的回归，也意味着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中断甚至是逆行。另一方面，中国的需求不足是刚刚启动市场化取向改革、市场化程度相当低、市场经济处于起步时期出现的问题。凯恩斯所面对的有效需求不足是西方市场经济充分发达时期出现的问题，是“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所以，“国家”干预的核心是如何扩大“市场”需求，如建高速公路使市场网络效应扩展等，而不是替代“市场”更

不是强化国家垄断部门、强行提高垄断产品价格去扭曲“市场”效应。再一方面，诚如前面涉及的，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属总量性，其形成原因也是从总需求包含的投资、消费等各方面去寻找的，并且是着重从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们的“心理”方面去寻找的。中国属结构性需求不足，不属于凯恩斯的总量性需求不足（当然在后面要给出详细论证）。其形成原因看来不限于凯恩斯的三个心理规律。正是这三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凯恩斯主义在中国实行变得无效率。如承袭凯恩斯主义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使政府加大投资力度，但是，内需不足现象依然故我。又如按照凯恩斯的货币流动偏好理论设计的降低利息的对策，在中国 1997 年年底以来先后施行了 8 次，但是，中国的城乡居民存款不仅未从银行流出，反而仍然增加，其速度总的看仍然远远高于 GDP 的增长速度。又如 2002 年 6 月底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 8.2 万亿元，同比增长幅度比上年末提升 1.7 个百分点。这个增幅又比 GDP 的增长率快了近 10 个百分点。中国的需求不足（内需不足）不属总量性，而属结构性，凯恩斯主义的药方又是针对总量性的，所以，内需不足的病症并未消解。“积极财政政策”也使投资率、政府投资率居高不下。因而，要解决有效内需不足，应从总量性理论转向结构性理论。

对需求进行结构分析并且以此分析经济发展问题的，是刘易斯及其二元经济理论。这个理论的框架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的是现代部门（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等）和非现代部门（传统农业、手工业等）。非现代部门储存着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有限供给的劳动力），发展的过程就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从非现代部门持续不断地流向现代部门的过程。中国理论界对刘易斯模型的介绍与应用基本上都在这个框架之内，其中对农村、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研究得较多些，这主要在于中国农村、农业有着过多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刘易斯模型隐含的有关需求及其结构变动问题则为人们忽略了。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的 4% 或 5% 的社会本身，变成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国民收入的 12% 到 15% 以

上的经济的过程”^①。刘易斯运用的是古典经济学模型。古典派强调供给，刘易斯也强调供给。劳动供给无限，资本供给有限，所以如何提高资本供给成了中心问题。但是，储蓄等于投资，供给的对应面是需求，储蓄比率以及投资比率的增加就是消费比率的降低，所以，储蓄率（投资率）从 4% 或 5% 增加到 12%、15% 乃至 20%，也就是消费率从 95% 或 96% 降低到 85% 到 80%。由此看来，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既是投资率（储蓄率）的提高又是消费率的下降过程，也就是需求结构的变动过程。换言之，对刘易斯模型更为准确的理解应当是：需求结构变动（消费率从 95% 下降为 85%、80%，投资率或储蓄率从 5% 上升到 15%、20%）→ 劳动力从非现代部门（传统农业、手工业等）流出 → 现代部门（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等）兴起直到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即两部门变成一部门或现代部门。费京汉、拉尼斯、托达罗等对这个模型作了补充。

钱纳里、赛尔昆等也提供了以需求结构为中心牵动经济发展的模型。他们所著的《发展的型式：1950~1970》提供了 101 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 GDP 从 100 美元以下到 1000 美元以上的发展过程的详细数据。这个统计模型的基本成果是：

与刘易斯模型相似，投资率、储蓄率的变动是中心，其数据为^②：

过程	中值 + \$ 100 以下	\$ 300	\$ 300	\$ 300	\$ 300	\$ 300	\$ 300	\$ 300	\$ 300	中值 = \$ 300 以上
储蓄	0.103	0.35	0.171	0.190	0.202	0.210	0.226	0.233	0.233	0.233
投资	0.136	0.158	0.188	0.203	0.213	0.220	0.234	0.240	0.234	0.234
资本流入	0.032	0.023	0.016	0.012	0.010	0.009	0.006	0.006	0.006	0.001
人力资本 投入 (教育支出)	0.026	0.033	0.103	0.034	0.035	0.037	0.041	0.043	0.043	0.039
私人消费	0.779	0.720	0.686	0.667	0.654	0.645	0.625	0.617	0.617	0.624

① 刘易斯著：《二元经济论》（中译本）施炜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 第 15 页。

② 钱纳里、赛尔昆著：《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中译本）李新华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 第 31~32页。

储蓄率从占 GDP 的 10.3% 上升到 23.3% 投资率从 13.6% 上升到 23.4% 资本流入即外资进入从 3.2% 下降到 0.1% 人力资本投入(教育支出)从 2.6% 上升到 3.9%。与此相应,消费率(私人消费与政府消费之和)从占 GDP 的 90.8% 下降到 76.5%;其中食品消费占私人消费比重即恩格尔系数的变动从 41.4% 下降到 16.7%。

需求结构即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的变动过程决定了产业结构。由于本项研究着重于需求结构,所以,产业结构的相应变动数据这里不予援引。

进而决定了贸易结构即进出口的变动。

进而决定了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劳动力从第一产业流出,从人均 GDP100 美元以下时第一产业占全部劳动力的 71.2% 下降到 1000 美元以上时的 15.9%。

进而决定了城市化:城市人口的比重从人均 GDP100 美元以下时的 12.8% 上升到 1000 美元以上时的 65.8%。

钱纳里模型比刘易斯模型更具普遍性。这是因为钱纳里等“力图在经验引出的发展型式与发展理论的演绎结果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①。钱纳里等吸取了刘易斯模型的“由于具有较高储蓄潜力的现代化资本主义部门增长较快,储蓄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将提高”^②的理论、吸取了恩格尔定律、吸取了“包括刘易斯(1954)、纳克斯(1959)、费拉拉(1964)以及凯利、威廉森和奇塔姆(1972)的例证”等各种理论成果。这是第一。第二,钱纳里等运用了库兹涅茨的统计研究方法,把视野扩展到整个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长期变动过程。第三,钱纳里等的经验统计数据较刘易斯等完整全面,如刘易斯模型主要以英国等为例证,而钱纳里则是

① 钱纳里、赛尔昆著:《发展的型式 1950~1970》(中译本)李新华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② 钱纳里、赛尔昆著:《发展的型式 1950~1970》(中译本)李新华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4~16页。

对 101 个国家地区的综合研究。第四 钱纳里等的的数据具有“可得性”^①。如“省略实物和人力资本的直接度量，而利用投资率和教育指数”^②。钱纳里模型的基本指标如投资率、储蓄率、个人消费率、政府消费率、恩格尔系数、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等等的的数据都有可得性，因为这是联合国、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又为世界各国（地区）所普遍采纳。而刘易斯模型的非现代部门、现代部门的划分往往很难采集数据 因为第一、第二、第三次产业中含有非现代的与现代的，如第二产业就包括手工业等。所以 钱纳里等提供的不仅是 3 种形式：“大国 均衡配量 小国 初级产品专业化 小国 工业专业化”^③而且“描述了一个穷国向富国进行全面结构转变的不同方面”^④，亦即给出了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型：需求结构（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变动 → 产业结构变动 → 进出口结构变动 → 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动 → 城乡结构变动（城市化）。正因为如此 不妨称钱纳里模型提供的结构为“标准结构”亦即优化或较为优化的结构。

然而 尽管谈到过捷克斯洛伐克、原民主德国、前苏联 钱纳里等经验统计分析的 101 个国家地区）其中并不包括中国、前苏联等计划经济国家。刘易斯模型试图把前苏联、中国等概括进去，但是，没有统计数据证明，只能笼统提及。钱纳里、刘易斯等在研究中均未考虑到制度问题，更未把制度作为内生变量。尽管如此，钱纳里模型仍然具有普遍性，因而，完全可以作为分析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变动过程时进行参照的“标准结构”。问题在于，中国学者似乎对刘易斯模型的关注程度远高于钱纳里模型。如对中国二元经济的研究文献就相当多。但是，无论对刘易斯模型还是对钱纳里模型在中国的运用，都忽略了刘易斯、钱纳里等强调的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在于储蓄率（投资率）的提高及其提高的程度（刘易斯是高到占 GDP 的 20% 钱纳里是高到人均 GDP1000 美元以上的接近 25%），亦即忽略了中心问题在需求结构的变动，并且

② 钱纳里、赛尔昆著：《发展的型式 1950~1970》（中译本）李新华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年 第 14~16 页。

由此切入去分析其他各种结构性问题。

应该看到,1997年以来,由于我国出现所谓“需求不足”“内需不足”的问题,中国学者相当关注需求问题。对我国需求疲软的一种判断是总量性的,认为近几年总需求回升一波三折^①。也有中国学者研究了中国需求结构及其变动。这方面的研究大体有两类。一类学者注意到了钱纳里模型,并且以此为标准结构去判断中国的需求结构。^②另一类学者并未运用钱纳里模型,因此对中国的需求结构变动作出的判断是:改革以来先是消费牵动并且形成消费过热(1985年~1988年)后是国内需求结构调整(外需变强,1989年~1991年)再后是投资牵动并且投资过热(1992年~1995年)^③。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未把结构变动如投资率变动与中国的需求不足性质连接起来,尚未认定其结构性需求不足的性质。这是其一。其二,尚未认定钱纳里模型、刘易斯模型之所以从需求及其结构切入,是在于投资率、储蓄率的提高,其标准是从5%或不到10%上升到20%或25%,或消费率的降低,亦即投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的变动是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由此得出其三,尚未分析中国需求结构的长期变动。这些研究之中最长时间段是取在1978年~1996年,都未超过20年。现在看来,钱纳里模型的人均GDP从100美元以下到1000美元以上的变动过程涵盖了我国近5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因此,考察中国的需求结构及其变动这个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应取1949年至今的全部时间段为好。有学者对中国目前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从结构方面给出判断。这个判断着重于供给,认为供给超过需求的产品

① 宋国青:《中国经济的隐患与中国金融的艰难选择》,《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12月10日。同类研究还有杨来科:《转轨时期我国总需求波动的特征与机理》(原载《税务与经济》2001年第1期)等等。

② 曾令华:《消费水平与经济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③ 郑高平主持的“国家统计局综合司课题组”:《对我国需求结构演变分析与研究》(《管理世界》,1997年第2期)。同类研究还有韩文秀:《总需求结构变化特征及对1997年经济工作的若干思考》(《中国工业经济》,1997年第1期)刘妍等:《论转型中的需求结构的变动趋势》(《统计研究》,2000年第11期)等等。

并非全部，还有部分产品如公共产品、高科技产品不是供给超过需求，而是供给不能满足需求。所以，“一方面是低水平供给的过剩，另一方面却是适应市场需求的供给短缺。”^①部分中国学者较为注意新制度经济学、较为注意体制（或制度）问题，有些学者把投资、经济周期与体制收缩相互联系进行研究，这很有创意。尽管这项研究取的时间段不长（10 年左右），也未把投资及其需求结构变动作为中心问题，也未涉及需求不足的性质等。^②

必须指出，计划经济时期，有些中国学者曾经指出过，投资率（积累率）不能过高，认为合理的比率是 25% 或以下。^③

1.4 理论模型^④

1.4.1 理论原型

这个原型是钱纳里模型。考虑到这个原型所概括的 101 个国家或地区并不包括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国家或地区这个事实，所以，作为钱纳里模型的实际涵盖的是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这样这个原型的起点当为市场化。这里把“市场化”定义为社会经济从非市场经济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如从自然经济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由于“经济”涵盖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所以，市场化也就是需求与供给从非市场需求与供给变为市场需求与供给的过程，亦即从自给自足变为借助市场进行交换得到供给以满足需求的过程。这是一。需求与供给都与“人”相关，自给自足是

① 赵晓雷：《中国总需求态势与宏观经济对策分析》（《上海经济研究》1998 年第 6 期），另参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http://www.drcnet.com.cn>：《对近年来我国内需不足特异性的反思》（2001-9-30）。

② 张曙光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课题组”：《投资、经济周期与制度性收缩效应》，《经济研究》，1999 年第 3 期

③ 参见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 年，第七章等有关章节。

④ 关于这个理论模型，原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现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学者都参与过讨论，并且用于地区经济的研究，见周伟林主编的《转型时期工业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

指人们（家庭或团体）自己供给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是指人们（个人家庭或团体）向“市场”供给其产品或劳务成为市场供给者，又从市场得到所需的产品或劳务成为市场需求者。

“市场”对所有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的，亦即人人（所有个人）都能自由进出、都按照等价交换其产品或劳务。非市场经济不存在这样的平等、自由，往往存在“特权”（只有少数人或极少数人拥有的权利）。这是二。市场化使产品、劳务价格化（指数化），使社会产品、劳务得以量化，亦使市场需求、市场供给得以量化。非市场经济难以量化。这是三。最后，市场化是个动态过程，其均衡是动态均衡。非市场经济基本是静态均衡。市场化作为一个动态过程来自其结构变动进而引起总量变动，来自需求结构变动进而引起总量变动。因为需求分为消费与投资。消费为人们的目标，投资尽管属需求，但不同于消费，因为投资形成供给，并且形成的是增加的供给，以满足增加了的需求：消费与投资。人们的消费需求得以增加，投资也得以增加，进而又形成新一轮的更为增加了的供给……钱纳里模型提供了需求结构的动态过程及其界限：消费率下降与储蓄率（投资率）上升及其界限（消费率降到 75%、投资率上升到 25%）。因此，市场化是整个社会、经济、整个人类在市场力量影响下发生变化的过程。而需求结构及其变动则是其中心。

需求结构的变动过程，作为投资率上升到 25% 的过程是供给总量扩张（人均 GDP 上升）的过程，又是供给结构变动的过程，即产业结构的变动过程。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过程是第一产业产值占全部增加值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上升的过程，而第二产业还常指加工工业，所以，这个过程可以概括为工业化。随着第三产业产值比上升到最高，这个过程在某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可以概括为后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是工业以及第三产业（乃至第四产业）对社会经济、对整个人类发生影响进而发生变化的过程。工业化、后工业化更加深刻地推动市场化，因为工业等非农业从其开始出现之时就是为“市场”而不是为自己提供其产品或劳务的。工业等非农业的发展也改造了传统农业，使其变成为“市场”，进而使农业等第一产业也按照工业的方式进行生产。这些变